

现代性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逻辑与实践导向

洪姗姗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社会工作的起源与发展, 同情境的探讨联系密切。时代的发展和政策的转型, 对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基层社会治理背景下,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具有在地的特点与挑战, 主要表现为主体的改变、目标的转变和情境的变化。本研究基于现代性理论分析视角, 并结合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情境, 提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逻辑与实践导向, 即跨领域协同、参与式议事和在地性行动。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应继续深植中国的历史脉络与在地的生活逻辑, 融合治理实践与中国文化的理论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现代性; 社会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 情境

[中图分类号] C 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2-0019-10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的作用, 既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高基层善治水平的重要体现, 也是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活力、解决基层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的有力支撑。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惯性背景下, 社会工作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以“助人自助”为根本理念的专业社会工作, 成为融合了社会工作价值和社会协调行动的社会治理形式^[3]。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起着服务型治理、柔性治理、社会团结与社会联结的作用, 并加速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4-7]。

基层社会治理的提出与发展, 同现代性的影

响有着直接联系。导致现代社会困境的主因之一, 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 即“生活世界殖民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 受到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度的挤压, 其解决的本质在于沟通行动^[8]。个体化的社会使得个体只关注个人的私人问题, 而丧失了其公民的身份, 减少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公共空间的丧失, 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个体与实际意义上的个体之间的鸿沟日渐加深, 也意味着一个真正自治的社会不可能到来^[9]。因此, 基层治理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运用多方协商的问题解决方式作为重要手法, 根据社区居民遭遇的问题来安排“多对一”的多方协商问题解决方案^[10]。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应该强调其专业化属性和自主性色彩^[11], 真正发挥专业社会工作思维和知识体系的作用, 转化一言堂家长制主导的协商模式, 培育现代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 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但在探索建立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在地化”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 厘清社会工作在民生改善、协同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的理论和实

[收稿日期] 2024-08-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农村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路径与政策协同研究”(22CSH042); 泉州市华大街道新铺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行动研究”(H2024145)

[作者简介] 洪姗姗 (1988—), 女, 福建厦门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研究。

践发展, 仍任重道远^[13]。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所呈现的历史现象和复杂性, 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没有遭遇过的, 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原有的始于西方的知识话语已不能分析和研究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 也无法解决多元综合的社会问题^[14]。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走向现代化洪流的组成部分, 既要借鉴外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 也要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15]。现代性是西方理论体系在应对现代社会的危机而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 既具备国际上的普适性, 也会因为在地的发展有所差异。在社会工作的语境下, “人在情境中” 核心观念的发展也同现代性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拟从现代性视角梳理社会工作实务发展脉络, 结合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对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要求分析在地特点, 论述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逻辑与实践导向。这既能够在实践层面指导我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实务, 也是对社会工作本土实务理论的深化发展, 并实现同国际社会工作研究的对话与交流。

二、人在情境中、现代性与社会工作实践

社会工作的起源与发展, 同情境的探讨联系密切。1917年, 玛丽·里士满的《社会诊断》一书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起点与奠基^[16]。此后, 社会工作实践的研究离不开同情境的探讨。比起其他学科, 社会工作更容易被不同的情境所形塑, 如物质情境、社会情境、政治情境、经济和文化情境等^[17], 社会工作是一门在历史、地理和制度情境中差异极大的学科^[18]。因此, 当我们想充分处理社会问题、设计社会工作方法时, 了解当地情况(社会问题、福利政策、本土价值观和态度、文化和传统、决策过程等)^[19]。对本土情境的强调, 也体现在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2014年修订的社会工作定义中, 该定义指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本土知识^[20]。尤其在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变革和随之产生的社会问题, 需要本土化的、情境化的、去殖民化的研究和知识生产体系^[21]。

因此,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需要充分理解情境,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任务和关系, 发生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22], 其中历史情境尤为重要^[23]。在社会工作实践的研究中, 学界将情境作为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人在情境中”相关论点进行探讨和创新。情境共包括内在社会的、外在社会的、内在物理的和外在物理的情境, 这些情境一起形成互动的动力矩阵, 共同影响个体行为^[24]。进而在社会角色、家庭系统、生命周期、整体发展的系统导向视角进行转化和演变, 发展出具有差异性的世界观、分析单位、变化本质、问题形成和方法论^[25-29]。其中, 整体发展的系统导向视角整合了全面的视角, 分析人所处情境中的系统, 探讨其中不同层面个体和情境间的动态冲突, 关注在不同世界中的结构变化、目标-手段关系的动力分析以及经验和行动之间的关系^[30]。

然而, 即便是整合的系统理论, 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时, 有时候也略显不足。社会工作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 必须在它的实践和价值之外, 理解塑造我们提供服务的人群和社区所处的环境和情境^[31]。生态系统理论作为一个普适性的社会工作理论, 面临核心概念不清晰, 对被压迫群体现状的强化^[32-33], 过于依赖生物和物理科学^[18], 欠缺实用性并与社会工作价值不符等批判^[31]。因此, 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融入复杂系统理论、现代进化理论和神经科学, 来理解人类生活的现代场景和随之增长的复杂性。社会工作必须关注人和情境之间持续性的变化和相互的依赖, 来设计和规划服务以应对现代的社会问题和挑战^[31]。

随着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长, Fook认为社会工作在应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时, 实践情境愈发重要^[34], 从而提出场景实践的概念^[17]。知识和身份是“置于”本土情境和不同参与者的视角中形成或者变化的, 意味着社会工作模式和实践只能与情境相关联^[35]。社会工作是一种批判性的实践方式, 需要提供灵活的、负责任的和反应迅速的社会工作实践^[36]。它是在话语体系中产生, 并且随着情境的转变而变化^[37]。因此, 后现代理论对于批判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能够在许多实践情境帮助社

会工作者生产性地参与到规则和决策权力中^[38-39]。后现代理论能够提供解构等工具，撼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并且后现代的分析能够关注到置于社会工作实践和政策制定中权力、身份和变化的复杂安排^[40]。由此可见，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现代性和实践情境同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关系与理论探讨愈发重要。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是基于日常场景，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此特点更为突出，对场景和其在在地性的考察是这种专业服务逻辑的核心^[41]。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是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的转变，关注的首先是生活空间而非行政空间，其制度的设计不仅要有宏大的行政视角，更要回归人本逻辑和生活导向^[42]。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下，对社会工作实践方向的指引，与现代性理论中回归到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公共空间的塑造、民主沟通机制的建立、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等核心论述不谋而合。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推动，对社会工作实践的服务逻辑影响和实践导向是西方社会所不了解也不擅长的，其理论发展虽可以为中国的实践探索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借鉴作用，但仍需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深耕中国的实践发展道路。

三、基层社会治理下社会工作实务的特点与挑战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探索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实证主义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展开，而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同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是分不开的”^[41]。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以场景服务为基础^[43]，近年来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政策文件的推动，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对社会工作定位角色的解读和探讨，都对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提出了与传统社会工作服务导向不同的要求，基层社会治理下中国社会工作实务有着在地的特点与现代的挑战。

（一）主体的改变

从服务对象来看，目前我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可以分为2种类型：一类是针对人群，主要是帮扶社区生活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一类是针对区域，提升居民的互助，增强公共生活意识和议事协商能力^[41]。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框架下的社会工作实务，与传统的人群服务不同，更关注的是所有人的服务，而不仅仅是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且人口的构成更加复杂，因阶级、阶层与群体而分化，随之产生的需求多样化、服务多元化^[44]，也对社会工作实践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参与主体来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转变，是力图摆脱严重依赖党政推动的动力困境。在实践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共同体建构中的公众参与^[45-46]。“五社联动”的提出，将社会工作作为主体之一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这也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需要具备同多方协同合作的能力。综上所述，传统的临床社会工作实践，已经无法适应基层社会治理框架下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对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应对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工作者需要同多学科、跨专业、不同领域和部门协同合作，建构高效专业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机制。

（二）目标的转变

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本身带着浓厚的在地特点。社会治理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和服务过程，包含了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社会服务、公共安全及社区治理等多方面内容，基本任务为协调利益关系、处理社会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等^[47-48]。“五社联动”是期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这些社会治理中最基础的元素发挥重要的作用^[49]，体现出专业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性^[50]。“五社联动”注重内生性力量的挖掘，需要运用民主协商的“软动员”方式，利用社会工作技术开展民主协商^[51]。社会工作的实践不再囿于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缺失增能什么服务的思路，而要求社会工作者能站位更高，从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利益等视角去评估服务

目标,设计服务方案,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已不再是单纯的弱势群体服务,而带有价值取向和治理导向,遵循的是服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52-53]。从目前社会工作的发展来看,社会工作的地区发展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均衡现象,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社会工作者多为当地民政协理员转型,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呈现零散性、缓慢性 and 专业性不强等特点^[54]。在社会工作基本的专业能力仍欠缺的情况下,同时缺乏清晰的社会治理实践指南和理论指引,对社会治理实践的掌握和探索更显吃力。专业力量与实践能力无法与目标转向匹配,社会工作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 情境的变化

社会工作在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时多以社区为平台依托,社会工作实务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服务上具有典型的在地性特点。即同一项社会服务在不同的社区会产出不同的服务方式,产生不同的服务效果,这受场域构成的主体、物质资源、行为策略、精神文化等因素融合影响,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55]。社会工作的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应落脚在社区,以专业社会工作重新建构基层治理架构,从体制与机制上形成以居民需求为目标的社区服务体系,进而形成基层社区治理的良性运作,并建构回应性社区^[44]。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转型提出“全域治理”的概念,其核心观点为基于地域但不限于地域,强调治理机制的开放灵活性、系统全面性、关系多元性和协同合作性,是一套突破时空界限、行政区划、社会边界的多领域综合协同共治体系^[56]。从社会工作的“五社联动”实践模式出发,“五社”中社区作为一种“场域”,更多的是一种“固化”平台,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组织,更多的是一种“移动”载体或平台^[57],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在关注在地社区的同时,还会联结到更广阔的实践情境,实践情境从个人的生活场景切换到更为宽泛的社会治理情境。另外,从镇街社工站建设的要求出发,服务的购买不是以单一社区或者村落为点开展服务,

而应该覆盖到整个镇或者街道。传统临床社会工作的实践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而基层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践,所处的实践情境已突破单一主体和单一场景、固定场域社区的局限,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境,具备更强的灵活性、跨域性和变化性,也即现代性所带来的碎片化、流动与解构。

随着参与主体的改变、目标的转变和情境的变化,基层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参与领域更为复杂、治理目标更加凸显、情境把握更加重要。但是,很多时候社会工作实务既无力回应社区民众的民生问题,也无法应对人与环境相互侵害的生态议题,这归咎于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的理论与实务双重困境^[58]。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本土情境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张力,应将零散的、碎片化的、经验性和个别性的实务经验总结凝练为一般性的服务模式或理论概念,反过来有效指导本土性实践^[59]。

四、现代性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实践

在对基层社会治理下社会工作实务的特点梳理后,发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发展主要聚焦于治理共同体建构、治理导向性探索和治理在地性实践,而现代性的知识生产体系、民主议事探讨和批判社会工作发展同本土实务理论的结合,能够为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实践指明方向。以下将结合现代性理论视角,探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实践服务逻辑与实践导向。

(一) 跨领域协同

Gibbons 等人^[60]认为世界正见证着知识的制度环境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巨变。知识生产模式1是在特定学科、认知和主流的学术情境中产生的传统知识,而模式2则意味着知识已经开始产生于学术机构之外,更广泛的、超学科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在修正版的模式2中,明确指出知识是在应用情境中生产出来,并且产生于更加多元的知识生产场所,具备超学科和高度反思性的特征,其质量控制呈现新型形式^[61]。为了处理社会的复杂性,Carayannis 等人综合系统理论、系统、集群和网络的概念,提出知识生产的模式3^[62]。在模式3中,知识是一个整合的术语,其

面临着不同系统的互动和交流，这些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研究与经验发展系统、科学与技术系统、教育系统。知识是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伴随着对知识应用导向的要求发展，知识系统的概念需要更多理论化的发展，知识生产不再是线性的而是螺旋创新发展的。知识生产模式3的五重螺旋创新系统，是在三重螺旋创新系统（高校－工业－政府）^[63]和四重螺旋创新系统（媒体和文化为基础的公共场所）基础上的升级，增加了“社会的生态环境”的螺旋架构^[64]。模式3创新性地整合了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的不同原理（如模式1和模式2），倡导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希冀于创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和革新的组织环境，涉及社会、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生态变化，五重螺旋创新系统具有生态敏感性^[62]。

多元发展的现代社会对知识生产与应用提出了进一步需求，与其所处的情境密切相关。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再局限于对困难群体的服务与帮扶，而更着重于解决在不同的实务情境之下，如何以基层治理的逻辑和思路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与实践时，面临日益复杂与多样的问题、需求、人群与场景，以传统的服务思路已无法解决复杂多变的危机与问题。因此，现代性下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情境的变化，对跨领域协同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值得指出的是，之前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实践也同样强调跨领域协同，但更注重对不同资源的整合与挖掘，从而更好地帮扶困难人群。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下，社会工作的跨领域协同实践同样需要资源整合，但资源整合的落脚点情境从西方以解决病理性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转换为治理情境在社区，其服务逻辑并不仅在于通过外在支持与帮助使群体增能，而更加关注如何调动多部门、多领域、多方人才与资源，提高问题解决效率以及治理成效，并降低矛盾发生的概率以及潜在的风险。

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下，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的转变，意味着原先在基层社会工作治理实践中是独立的个体，要转换成为相互合作、协同治理的共同体，共筑知识生产系统。即强调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的实践

中，需要考虑到各个治理主体的动力、需求、目标和利益，在综合评估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调动参与主体一起行动。传统上聚焦对服务对象的评估方式，要转变为对治理参与主体的综合评估。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需要注重与社区的协作，因为社区既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也是主要的实践场域，需要考虑其生态敏感性，需要与社区方相结合，才能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实现螺旋式创新发展。再者，基层治理下的社会工作跨领域协作实践，是在确保“助人自助”的同时，超越资源的再分配，最终实现资源再生产，从而解决利益冲突，化解纠纷，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

（二）参与式议事

民主既是重塑公共空间的重点，也是增进沟通行动的资源之一。社会复杂性和规模限制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既是议事性也是参与性，回应现代性下对民主和治理要求，需要通过参与议事民主推动基层民主，即在参与式民主与议事性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两者的融合。参与议事民主整合了参与和议事的理念，其民主的合法性是基于人民积极和持续的参与，从而在议事过程中聚焦于集体议题并解决处理^[65-70]。参与和议事的串联，同“网络治理”的兴起密不可分^[66]。与传统的自上而下无争议的中心权威统治相反，治理采取合作、契约、圆桌、政府内部会议、不同类型的委员会等，基于对“情境式掌舵”的偏好，在抵消利益碎片的离心力的同时，也源于对国家缺乏必要的资源独自完成任务的认识^[71]。参与范式性需要扎根于复杂与宏大的社会^[67]，议事民主的参与层面，是自治的理想状态^[72]。

社会工作的传统社区工作实践多沿用西方模式，而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将不再拘泥于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工作，仅关注社区发展与人群帮扶，而是以治理为导向的社区工作。参与式议事不仅是实践手段，更是培育的目标引领，其本质在于回应现代性下对民主和治理的需求，激活社区活力，重塑公共空间，以解决现代社会的沟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将从传统支持协助社区议事的角色，成为议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需要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特别是群众的参与，通过诉求的表达以及议题的

协商,调和人群矛盾或社区层面的社会问题。以多样化的实践手段为载体,处理人群与人群之间,或人群和其他部门或其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而形成良性的沟通和问题解决机制,借力参与式议事实践达到社区教育的目的,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建构,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落实并完善基层民主实践。

基层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目标开始呈现在地化的发展特点,并非围绕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和需求满足开展临床服务,这也体现出与西方社会工作服务逻辑的差异性。在确定目标导向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在地特点,探索参与式议事实践模式。基本思路主要在于确定各方代表,协调调动多方参与协商议事确定议题。议题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产生,非正式路径即通过活动吸引居民走出来,以居民自主探讨推选代表的方式确定选题,再与社区方和相关主体进行对接确定可以共同行动的议题;正式路径则是以社区方为议题商定的主要切入点,主要关注群体利益,以及社区迫切处理的问题或关注的矛盾,选举居民代表和相关方共同参与,制定行动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议题的探讨和行动的分解,通过以解决为导向而非以讨论为目的开展参与式议事会。同时,随着新业态群体的快速增长,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也可能开始超越传统的社区治理范式,呈现流动式治理模式。参与式议事实践将对社会工作者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巧,还要理解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提升治理实践意识,增强自身综合能力,在此基础上推动多方参与,并推进议题的处理和解决,带动居民参与,激活社区活力,重塑真正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增进沟通行动。

(三) 在地性行动

西方的科学体系和现代性的出现,使得本土知识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灭绝的危机。当情境的变化对本土社会工作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出挑战时,如何扎根本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而开展在地性实践需要回到对本土知识的探讨。

本土知识是本土族群特有的本土化知识,是人们通过经验的、非正式实验和在特定文化环境

的亲密理解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依赖于民间生活的价值、规范和习俗,通过不断非正式实验尝试的产物,与科学知识共同组成全球性知识。其作为内在的珍贵资源,是在历史沉淀下所产生的应对策略或韧性机制。本土知识能够促进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减少贫困,纠正历史性不平等,促进民主和丰富全球性知识。本土知识并不只是认识论,更是一种实践的知识,并通过本土的治理结构强化本土知识体系和知识传输机制。目前,各种社会治理的创新做法,并未达成原定的目标,未产生持续的效果,无法使居民产生共同的归属感,原因在于并未形成社会治理的“日常生活化”^[73-78]。

相对于科学知识,本土知识与它的环境有更为密切的联系,难以同情境剥离提炼。因此,基层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践,需要关注本土知识本身以及本土知识的生产情境,并将其与实践相结合。在地性意味着对本土知识保持警觉与敏感,将其视为动态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从而与流动的场景相结合,将社会治理实践根植于日常生活中。若延续西方的机构服务逻辑,期望服务对象脱离日常生活情境实现成长,社会工作的治理服务就会与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还要将批判反思同本土知识相结合,既要关注社会工作实践者对本土知识的觉察与意识,增强自身的批判反思能力以促进实务发展,更要提升参与对象自身的行动性反思,将服务与实践同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并将治理落实到行动中。与传统仅聚焦于实践者本身的批判反思的实践有所区别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反思,应根植于日常生活安排,将参与者的反思与日常行动相结合,即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安排。

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在本土知识的基础上开展实践与创新。虽然西方的专业体系与方法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务服务逻辑有所区别,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摒弃之,若在具体实务场景中加以调整,传统的社会工作技巧与方法仍能在实践情境中发挥专业作用。在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对本土知识进行了解与评估,在社会治理的全局框架基础上,设计开展在地性社会工作服务与实践,通过社会工作实践推进共同的治理行动。在地性行动不仅

是对实践者的要求，要求实践者要置于治理情境中，感知与评估本土知识开展服务与实践；也要求研究者不能脱离实践，仅仅以观察者、自上而下的研究者的身份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而是要在行动中做研究。另外，更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结合治理情境，在日常生活的行动反思中共同解决在地性问题，处理本土性纠纷，推进在地的治理型发展。

五、结 语

现代性视域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引，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工作在本土情境下，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区别和转向。在推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领域，找准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与作用空间，是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管理与实务发展中的重要任务^[79]。深化现代性视域下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要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现代性视域下的社会工作研究走向，应在本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文化脉络，挖掘跨领域协作治理动力，探索参与式议事基层治理实践模式，结合日常生活行动反思，保持研究者与参与者在实践场域的高度卷入，发展具有在地力量的社会工作理论。这既能够在实践层面指导我国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实务，进一步深化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实务理论，建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实现同国际社会工作研究的对话与交流。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徐晓军. “政法規制”与“社工服务”：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两只手”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22（5）：1-9.

- [4] 王思斌.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及其贡献：对服务型治理的再理解 [J]. 社会治理，2015（1）：49-57.
- [5] 吴同，胡洁人. 柔性治理：基层权力的非正式关系运作及其实现机制：以S市信访社工实践为例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37-145.
- [6] 徐晓军，袁秋菊，汤素素.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边缘人群社会治理的优势与路径 [J]. 理论月刊，2022（2）：95-102.
- [7] 田毅鹏. 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 [J]. 学术月刊，2021（3）：125-132.
- [8] HABERMAS J, MCCARTHY T. Life 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 [9] 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 [M]. Britain: Polity Press, 2012.
- [10] 童敏，杜经国. 现实建构主义：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及理论依据 [J]. 社会工作，2022（6）：1-15.
- [11] 文军，方淑敏. 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困境及其行动策略：基于社区治理中互动场域视角的分析 [J]. 学术界，2022（12）：72-82.
- [12] 郭伟和. 深化理解基层协商民主，增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协商的能力 [J]. 中国社会工作，2022（34）：18-19.
- [13] 王力平. 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发展 [J]. 甘肃社会科学，2019（5）：171-178.
- [14] 陈凡，何俊. 新文科：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7-11.
- [15] 王思斌.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J]. 社会工作，2023（1）：96-98.
- [16] RICHMOND M E. Social diagnosis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7.
- [17] FOOK J. Social work: A 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M]. LA: SAGE, 2022.
- [18] HEALY K. 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Creating frameworks for practic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5.
- [19] LYGSTAD R. Contextual social work and internationalizing social work education: Two sides of the same story? [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3, 13（4）：400-418.
- [20] IFSW. 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DB/OL].

- (2024-07-01) [2024-12-24]. <https://www.ifsw.org/what-is-social-work/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
- [21] GRAY M, COATES J, BIRD M Y, et al. Decolonizing social work [M]. UK: Routledge, 2016.
- [22] ROWE W, RAPP-PAGLICCI L 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M].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
- [23] MUNFORD R, SANDERS J. Embracing the diversity of practic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mainstream social work practice [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2011, 25 (1): 63-77.
- [24] WEICK A. Reframing the person-in-environment perspective [J]. Social Work, 1981, 26 (2): 140-143.
- [25] ALLEN V L, VAN DE VLIERT E A, Eds. Role transitions: Explorations and explanations [M]. New York: Plenum, 1984.
- [26] BALTES P B, BRIM O G,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27] RODGERS R H. Family interaction and transaction: Th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M].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73.
- [28] ERIKSON E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8.
- [29] MOOS R H, SCHAEFER J A. Coping with life cri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New York: Plenum, 1986.
- [30] WAPNER S, CRAIG-BRAY L. Person-in-environment transition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2, 24 (2): 161-188.
- [31] GREEN D, MCDERMOTT F. Social work from inside and between complex systems: Perspectives on person-in-environment for today's social work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0, 40 (8): 2414-2430.
- [32] REID W J. Knowledge for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An analysis of trends [J].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02, 76 (1): 6-33.
- [33] FINN J L, JACOBSON M. Just practice: Steps toward a new social work paradigm [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03, 39 (1): 57-78.
- [34] FOOK J. Creative spac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1: 55-64.
- [35] GRAY M, FOOK J. The quest for a universal social work: Som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J].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04, 23 (5): 625-644.
- [36] FOOK J. Social work: A critical approach to practice [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22.
- [37] HEALY K, MULHOLLAND J.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ctivist social work: investigating practice processes [J]. Th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1998.
- [38] HEALY K. Participation and child protection: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8, 28: 897-914.
- [39] STANLEY L. ed. Feminist praxis: Research,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236-249.
- [40] HEALY K.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work: A critical appraisal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1, 44 (1): 93-105.
- [41] 童敏. 场景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42] 周进萍.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2 (10): 97-107.
- [43] 童敏, 刘芳. 基层治理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 [J]. 河北学刊, 2021, 41 (4): 30-36.
- [44] 何雪松. 基层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回应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6 (4): 109-112.
- [45] 徐畅. 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何以可能: 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2 (9): 36-44.
- [46] 阙为, 钱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理论逻辑与嵌入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8): 88-95.
- [47] 姜晓萍.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24-28.
- [48] 龚维斌. 多维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现代化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 (10): 14-18.
- [49] 原珂, 赵建玲. “五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 30 (4): 75-82.
- [50] 任文启. “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J]. 中国社会工作, 2022 (1): 14-20.
- [51] 许宝君, 陈伟东.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 (9): 80-88.
- [52] 田鹏. “服务吸纳社会”: 服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9, 19 (3): 71 - 77.
- [53] 姚进忠, 林悦盈. 服务型治理: 乡镇社会工作站的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0 (4): 128 - 146.
- [54] 卫小将, 黄雨晴. 利益共生视角下地摊经济的赋权式治理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4): 132 - 141.
- [55] 梁华. 我国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 [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 23 (1): 18 - 23.
- [56] 杨发祥, 郭科. 全域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转型 [J]. 学习与实践, 2021 (8): 84 - 96.
- [57] 原珂. 中国特大城市社区治理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58] 张和清, 尚静. 社会工作干预与中国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研究: 以绿耕项目为例 [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 (6): 68 - 89.
- [59] 汪鸿波, 费梅苹. 话语结构、实践本位: 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逻辑再审视 [J]. 学习与实践, 2019 (8): 73 - 80.
- [60]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et al.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M].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London: sage, 1994: 1 - 192.
- [61] SCOTT G P, NOWOTNY H, GIBBONS M. Mode 2 revisited: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J]. Minerva, 2003, 41 (3): 179 - 194.
- [62]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REHMAN S S. 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Systems and systems theory, clusters and network [J].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6, 5 (1): 1 - 24.
- [63] 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 - industry - government Relat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 (2): 109 - 123.
- [64]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Triple helix, quadruple helix and quintuple helix and how do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relate to each other?: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a trans - 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c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 1 (1): 41 - 69.
- [65] COHEN J. Reflections 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9, 247 - 263.
- [66] ELSTUB S. Deliberative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2018 (2): 11 - 20.
- [67] WARREN M E. Participator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omplex mass societies [J]. Journal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2020, 16 (2): 22 - 30.
- [68] VITALE D. Between deliberative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 contribution on Habermas [J].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006, 32 (6): 739 - 766.
- [69] FLORIDIA A. From Participation to Deliberation.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M].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6.
- [70] CINI L, FELICETTI A. Participator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oward a new standard for assessing democracy? Some insights into the Italian case [J]. Contemporary Italian Politics, 2018, 10 (2): 151 - 169.
- [71] TEUBNER G, FEBBRAJO A. State, law, and economy as autopoietic systems: Regulation and aut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M]. Europe: Giuffrè, 1992.
- [72] LAFONT C. Democracy without shortcuts: A participatory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73] MAWERE M.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IKSs) potential for establishing a moral, virtuous society: Lessons from selected IKSs in Zimbabwe and Mozambique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2010, 12 (7): 209 - 221.
- [74] GUPTA A D. Way to study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J]. Research Journal of Recent Sciences, 2012, 8 (2): 11 - 30.
- [75] MAVHURA E, MANYENA S B, COLLINS A S, et al. Indigenous knowledge, coping strategies and resilience to floods in Muzarabani, Zimbabw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3 (5): 38 - 48.
- [76] BAR - ON A. Indigenous knowledge: Ends or mean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15, 58 (6): 780 - 789.
- [77] LATULIPPE N, KLENK N. Making room and moving over: Knowledge co - product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overeignty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decision - making [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20, 42 (2): 7 - 14.
- [78] 王春光.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4): 1 - 10.
- [79] 李迎生.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社会工作研究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 (1): 12 - 19.

Service Provision Logic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of Social Work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 Modernity Perspective

HONG Shanshan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nd its origin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operates.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times and shifts in policy have introduced new demand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China. Social work in China must pursue localization while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stakeholders, goal reorientation, and changing situations. This paper integrates a modernity perspective with the unique context of indigenous social work practice, proposing strategies for service provision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cross-agency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ory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and localized actions. Indigenous social work practice should be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ligned with local life dynamics, and informed by integrated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Chinese cultural theory research. This approach aims to build a social work theor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Key words: modernity; social work;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ituation

(责任编辑 张永汀)

引用与注释的内容与格式

4.3.1 中文引文注释的必要内容著作需注明:

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出版时间/章节及页码;

文集析出文献需注明: 作者/析出篇名/文集题名/文集编者/出版者/出版年月/页码;

古籍需注明: 原作者/书名/部类名/卷次或篇名/版本;

期刊需注明: 作者/篇名/期刊名/年期;

报纸需按顺序标注: 作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

未刊文献需注明: 文献标题(用双引号, 引用者自拟标题不用引号)/时间/藏所/编号;

网络文献需按顺序标注: 作者/文献名/网址/网上发布时间/访问时间。

4.3.2 外文引文注释的必要内容

引用外文文献专著、编著需注明: 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及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

外文引文译著需注明: 作者/译者/原著书名/译著书名/出版地点及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

引用外文文献期刊中的析出文献需注明: 作者/文章名/刊物名/卷期号/出版时间/页码;

引用外文文集析出的析出文献需按顺序标明: 作者/文章名/编者/文集名(要求特殊字体)/出版地点、机构及时间/页码。

摘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编写),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